

1940年宁波鼠疫“敌机散毒”考

周东华

摘要 1940年侵华日军731部队利用“雨下法”在浙江鄞县、衢县和金华三地实施鼠疫战,致使三地暴发鼠疫,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对此史学界几成定论之侵华日军鼠疫战史实,有学者认为系“建构”而非“历史的真实”。通过爬梳、比较和考证1940年《时事公报》《宁波民国日报》刊载的新闻报道、日军战俘伯力城审讯记录、《井本日志》、《金子顺一论文集》、国民政府卫生部门调查等史料,本文证实1940年侵华日军在以鄞县为代表的浙江三地“敌机散毒”是无可辩驳的史实。民国时期的媒体、国民政府各级卫生防疫人员、日本军医和作战参谋、日军决策层和细菌战执行者没有说谎。所谓抗战时期和当下史学工作者基于“民族主义”建构了侵华日军细菌战的说法,既不尊重历史本身,也是对史学界长期研究侵华日军细菌战同道的不尊重,更是对遭受侵华日军细菌战同胞及其后人的侮辱与伤害。

关键词 细菌战; 1940年鄞县鼠疫; 敌机散毒; 史料实证

中图分类号 K26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873(2020)06-0103-12

作者简介 周东华,杭州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浙江省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 311121

2020年春节前后,中华大地笼罩在新冠病毒阴影下,有关公共卫生与传染病防疫问题,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从事疾病史、卫生史和防疫史研究的史学工作者,从历史角度,尤其是近代中国历史中观察传染病防治的经验教训。有一位历史学者就抗战时期鼠疫及其防治史发表访谈,称“侵华日军的鼠疫战是建构的,并不是历史的真实”。在他看来,“民国时期的老百姓会作假,卫生防疫人员会作假,政府部门会作假,日本军医会作假,作战参谋也会作假”,“我们的学者只将对他们有利的材料拿出来谈,证明日军有罪,以至于此事变成定论”。他认为是“战时的民族主义与战后的民族主义,共同造成了这一结果”。目前他正在研究浙江衢州、金华、宁波,还有湖南常德的侵华日军鼠疫战,并指出“推翻定论,就是我目前的工作”。^①虽然该学者“推翻定论”的专题论文尚未见到,但其在访谈中就抗日战争时期日军鼠疫战提到的中日亲历者的史料造假、学者只将对他们有利的材料拿出来谈、侵华日军鼠疫战不是历史的真实、中国持续的民族主义“建构”根源四点,足以引起研究者的重视与反思。

与该学者认定侵华日军的鼠疫战,尤其是1940年浙江鄞县^②、衢县和金华三地鼠疫战是“建构”不同,从1943年金宝善刊文论及1940年浙江细菌战,到1985年徐绍全发表《日本侵略者在浙江的细菌战述略》一文,再到2019年浙江省委党史和文献研究室、浙江省档案馆合编出版《日军侵浙细菌战档案资料汇编》(第7—10册),近藤昭二和王选主编出版《日本生物武器作战调查资料》(全6

^① 曹树基《瘟疫与防疫,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的魔幻交替》, <https://new.qq.com/omn/20200220/20200220A06KSY00.html>, 2020年2月20日,访问时间:2020年10月21日。

^② 抗日战争时期(1931—1945),无“宁波”建置,时称“鄞县”。1940年鄞县鼠疫,指1940年发生在今宁波市中心开明街一带的鼠疫。本文“鄞县”与“宁波”并用,实指同一地域。另,文中“衢州”与“衢县”的使用亦相同。特此说明,并感谢匿名评审专家提醒此点。

册),中日学者一致将1940年浙江鼠疫肇因归于石井四郎及731部队的侵华日军细菌战。^①

1940年鄞县、衢县、金华三地的鼠疫和1942年浙赣战役期间金丽衢地区的鼠疫,究竟是肇因于自然疫源地还是侵华日军细菌战?是亲历者的史料造假还是研究者的误读?是史学工作者的史实“重构”还是民族主义的历史“建构”?回答这些问题的起点是“史料”。

有关1940年浙江鼠疫的基础史料,日方史料主要是两类:第一类是日军细菌战部队未销毁的资料,其中最重要的是金子顺一的研究报告和井本熊男的工作日志;第二类是战后伯力城审判等日军战俘的口供或回忆证词。中方史料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中国各级政府档案,核心史料是容启荣浙江鼠疫调查材料和浙江省各级政府的往来公文、电报等;第二类是报刊史料,尤其是1940年浙江鄞县、衢县等地出版的报纸。鉴于已有研究尚未充分、运用这些基础史料,本文将系统梳理、对比鉴别、综合运用上述史料,以1940年鄞县中日鼠疫战为例,破解侵华日军细菌战的真相。

一 寻找“白色烟雾”:鄞县报刊中的“敌机散毒”

1949年伯力城审判日军战犯柄泽十三夫的起诉书记载“1940年9月,石井将军带了部队内其他一部分军官到汉口去,同年12月返回了本部队。据那些随同石井将军到过汉口的军官转回来时说,使用染有鼠疫跳蚤一举,业已奏效。散布跳蚤的结果引起了鼠疫流行症。参加过那次远征队的野崎少佐曾拿出一份中国报纸给我看,报纸上有篇论文指出说,宁波一带发生了鼠疫。”^②当检察官问“这报纸上记载有什么消息呢?”柄泽回答“据我记得,这报纸上写过,在宁波一带发生此次瘟疫之前,有数架日本飞机在上空飞过掷下过某种东西。”检察官追问“你亲自看见过这段新闻么?”柄泽回答“是的,我亲自看见过。”^③

根据柄泽十三夫的供词,石井四郎率731部队于1940年9—12月间在鄞县发动过细菌战实战试验,其中鼠疫战奏效,其实战效果为鄞县当地报纸所证实。这就提醒我们,在探究1940年鄞县鼠疫发生原因时,可追溯当时该地出版的报纸。《时事公报》和《宁波民国日报》是当时鄞县发行量最大的两份报纸,学者们在整理、探究宁波史时,所利用的报刊也主要是这两份报纸。具体到1940年鄞县鼠疫,学者们梳理和利用的主要是1940年10月22日—10月29日之间的《时事公报》,而这对弄清楚1940年9—12月日军的空袭及细菌战,是远远不够的。实际上,仅1940年10月这一个月,《时事公报》刊登日机侵扰鄞县10天,至少27次。具体如下:1940年9月30日7点45分临山上空

① P. Z. King, “Bacterial Warfare,” *The Chinese Medical Journal*, Vol. 61, no. 3, July-September, 1943, pp. 259—263. 徐绍全:《日本侵略者在浙江的细菌战述略》,《宁波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3期;吉見義明、伊香俊哉《日本軍の細菌戦》,戦争責任資料センター《季刊・戦争責任研究》第2期(1993年冬季号);森正孝、糟川良谷編《中国侵略と七三一部隊の細菌戦》,明石書店1995年版;森正孝《日军细菌攻击的初步展开》,《浙江学刊》1997年第4期;朱雪芳《日军在宁波实施细菌战及其原因简析》,《宁波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1期;包晓峰《日军对浙江实施细菌战的罪行综述》,《党史研究与教学》2005年第3期;魏巍《1940年日军对宁波细菌战的几点研究》,《宁波党校学报》2005年第4期;韩雯《保存在国外档案馆的有关浙江细菌战的几则史料》,《浙江档案》2005年第9期;朱清如《侵华日军衢州、宁波细菌战致死居民人数考》,《军事历史研究》2015年第1期;陈致远《侵华日军在中国南方实施的细菌战》,《军事历史研究》2015年第1期;赵晓红《1940年代浙江鼠疫流行与政府应对》,《浙江档案》2015年第5期;韩李敏《档案是历史的真实记录——谈〈日军侵浙细菌战档案资料汇编〉编纂的几点体会》,《浙江档案》2017年第7期;汪鹤飞《侵华日军实施宁波细菌战的史料实证研究》,《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日本軍による細菌戦の歴史事実を明らかにする会編著《細菌戦が中国人民にもたらしたもの 1940年の寧波》,明石書店1998年版;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日军在浙江细菌战专题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竹内康人《日本陸軍のアジア空襲爆撃・毒ガスペスト》,社会評論社2016年版;中共浙江省委党史和文献研究室、浙江省档案馆编《日军侵浙细菌战档案资料汇编》(1—10册),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2019年版;近藤昭二、王选主编《日本生物武器作战调查资料》(全6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

② 《起诉书·在对华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印行,第24—25页。该书同时出版俄文版和中文版,本文使用的是中文版,下文不再一一注明。

③ 《被告柄泽受审经过》,1949年12月26日早庭审讯,《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280—281页。

发现敌机一架,本埠发出防空警报。“该机过百官、绍兴,向西北出海而没。”^①10月3日“本埠昨发警报六次,敌机在沿海一带窥察,并在本埠上空,散发荒谬传单”。^②10月5日日机4次侵扰鄞县。^③10月6日4架日机3次侵袭鄞县地区。^④10月8日4架日机4次侵扰鄞县,投弹9枚,炸死2人,伤5人。^⑤10月11日一架日机过甬。10月17日日机5次侵扰鄞县。^⑥10月25日晨7点8分敌机在曹娥投弹2枚后,向西北逸去。^⑦10月27日敌机3次从鄞县上空掠过。10月31日,日机又两次飞过鄞县城区。^⑧从10月日机空袭鄞县主城区情况看,主要活动是实弹空袭和散发传单两种,并无“敌机散毒”字样的新闻报道。

进入11月后,鄞县当地报纸开始刊登鄞县鼠疫消息。11月2日《时事公报》称,鄞县城关镇开明街于10月30日“发现流行急性疾病,蔓延甚烈”,3日内不治身死者已达10人以上,其病状为“恶寒、发高烧,旋即不省人事,临死有腹泻”。^⑨鄞县卫生院收到报告后,“将细菌作初步研究后,觉与鼠疫相似”,^⑩华美医院院长丁立诚认为“尚未能断定其为真实鼠疫”。^⑪11月4日,经过鄞县政府卫生指导室、鄞县卫生院、鄞县各公私立医院救治检验,“已可断定其为鼠疫”。^⑫华美医院“经过解剖与细菌检查,已可确定此次所流行之疫症确系鼠疫”。^⑬在确认开明街染疫病情为鼠疫后,鄞县各级政府开始了鼠疫防治战。县长俞济民发布《鄞县县政府布告》第291号,称“我们宁波不幸发生鼠疫巨祸”,必须“严厉封锁”,为此“布告全县民众一体遵照”,“不论亲友一律拒绝收容”。^⑭设立隔离区和隔离医院,报刊宣传鼠疫防治条例等,鄞县的鼠疫防治战积极有效,鼠疫蔓延很快得到有效控制。

从《时事公报》刊登的新闻来看,11月29日才出现第一则“敌机散毒”报道,是关于日机在金华投毒的消息,“敌机袭侵金华,除投毒外,并投放革兰氏阴性杆菌,图加害我无辜民众”。^⑮同日有关鄞县鼠疫防治的新闻,有相当篇幅,但丝毫没有谈及鄞县鼠疫病源系日机空投所致。12月3日刊登的报道称本省鄞县、衢县先后发生鼠疫,“疫菌传系敌机投下。证之近来敌机屡次在金华散布白黄色粉粒,不为无因。敌人居心险恶,放毒事属可能”。^⑯按照“敌机散布白黄色粉粒”或“敌机投下”的字样判断,1940年12月前的鄞县报纸都没有刊登“敌机散毒”新闻。这样的判断是否准确呢?

从既有研究看,学者们大都未能逐日阅读1940年10月1日—11月30日鄞县当地的《时事公报》和《宁波民国日报》等报纸,有可能遗漏了“敌机散毒”的新闻报道。实际上,在1940年10月5日日机第4次侵袭鄞县时,《时事公报》和《宁波民国日报》都有“敌机散毒”的报道,只是当时没有用“敌机散毒”字样。《时事公报》称“第四次警报,十五时十二分,余姚庵东闻有机声,本埠当发空袭紧急警报。旋在临山发现敌机二架,经余姚、慈溪,窜入本埠上空盘旋,先散放(白)色烟雾,继即

① 《敌机一架昨晨过绍》,《时事公报》1940年10月1日,第2版。

② 《甬六次警报敌机投荒谬传单》,《时事公报》1940年10月4日,第2版。

③ 《敌机四架袭奉化》,《时事公报》1940年10月6日,第2版。

④ 《敌机4架昨袭宁海溪口两地》,《时事公报》1940年10月7日,第2版。

⑤ 《敌机昨袭慈溪》,《时事公报》1940年10月9日,第2版。

⑥ 《敌机昨袭五夫,敌舰炮击浦口》,《时事公报》1940年10月18日,第2版。

⑦ 《敌机一架昨袭曹娥》,《时事公报》1940年10月27日,第2版。

⑧ 《昨晨敌机一架飞甬投荒谬传单》,《时事公报》1940年10月28日,第2版 《敌机昨日两度过甬》,《时事公报》1940年11月1日,第2版。

⑨ 《市区发现传染病,卫生院设法防治》,《时事公报》1940年11月2日,第2版。

⑩ 鄞县卫生院《谈鼠疫》,《时事公报》1940年11月3日,第1版。

⑪ 《医师谈话》,《时事公报》1940年11月4日,第1版。

⑫ 《东后街之传染病断系鼠疫,疫区已加封锁》,《时事公报》1940年11月4日,第1版。

⑬ 鄞县卫生院《对于鼠疫之防治措置》,《时事公报》1940年11月5日,第1版。

⑭ 《鄞县县政府布告》第291号,《时事公报》1940年11月5日,第1版。

⑮ 《敌机袭金华散发毒菌》,《时事公报》1940年11月29日,第2版。

⑯ 《敌机投放毒药与鄞衢两地鼠疫不为无因》,《时事公报》1940年12月3日,第1版。

散发红绿纸荒谬传单,后来折回慈溪、余姚、临山。”^①《宁波民国日报》称“下午三时十二分,余姚庵东由南至北闻敌机声,本埠再发第四次空袭紧急警报,旋在临山上空发现敌机二架,经余姚慈溪侵入甬空盘旋,散发荒谬传单,但多落在乡间偏僻地点,当时机后有白烟二道缭绕,历久始消逝。”^②两份报纸的新闻报道大同小异,都记录了两架日军飞机盘旋于鄞县上空,散发荒谬传单,施放白色烟雾,许久才散去。这两股“烟雾”是什么?按照日俘西俊英的说法,1940年鄞县鼠疫战中,日军撒下的是“一股带有鼠疫跳蚤的烟气”,并不是掺杂鼠疫跳蚤的小麦或粟米。

日俘西俊英1949年12月26日晚庭审记录显示,当法官让他交代在731部队内“亲自看见过一些什么有关于在中国内地进行远征的情形”时,西俊英回答他“看见过一部说明第731部队所派远征队于1940年间在华中一带动作情形的纪实影片”。这部“纪实影片”最先映演的是“装有染上鼠疫跳蚤的器皿怎样安置到机身下面去”,然后映演“撒放器怎样安置到飞机翅膀上去”,并有“一段解释说明这一器皿内盛有鼠疫细菌”。四五个人坐上飞机后“就飞到了敌军上空”,镜头中出现“飞机动作,中国军队移动及中国村庄情景”,接着“就出现有一股烟气脱离飞机翅膀向下坠去”,随后就有一段解释,“说明这股烟气乃是撒放到敌军头上的鼠疫跳蚤”,然后飞机就飞回机场,银幕上出现了“作战完毕”字样。飞机降落后,消毒人员来对飞机消毒。石井四郎和碓常重下机后,影片出现“战果”二字,“映出一份中文报纸以及从这份中文报纸上译成日文的一段消息”,解释文上说“在宁波一带忽然间发生了强烈的鼠疫流行病”。影片最后一组镜头是“中国卫生队身穿白大衫在发生鼠疫的地区消毒情形”。^③西俊英的供词提供了日军1940年鄞县鼠疫战两个最重要但却一直为人忽视的细节:第一,石井四郎如何从飞机上将鼠疫跳蚤投掷到鄞县——装有鼠疫跳蚤的器皿安装到撒放器上,飞到鄞县上空后,“一股烟气脱离飞机翅膀向下坠去”,这股“烟气”中是鼠疫跳蚤。第二,鄞县中文报纸上刊登的是鄞县一带忽然发生强烈鼠疫流行病,中国卫生队正在防疫的消息。这与前文所引1940年10月底至11月底之间《时事公报》和《宁波民国日报》所刊登的鄞县鼠疫及防治新闻内容高度一致。日军用飞机直接投掷鼠疫跳蚤,而非投掷掺杂鼠疫跳蚤的小麦或粟米。这就能解释1940年10月1日—11月15日《时事公报》刊载日机空袭报道和鼠疫报道中,为何丝毫没有日机投掷小麦或粟米的报道。

10月5日《时事公报》和《宁波民国日报》的新闻报道,与西俊英伯力供词提供的石井四郎飞机投掷鼠疫跳蚤细节的论述十分吻合,证明日军对鄞县的鼠疫战发生在10月5日,证明日军1940年鄞县鼠疫战的主要方式是“敌机散毒”。日军1940年鄞县鼠疫战采取的是最直接的高空撒放鼠疫跳蚤方式,成效不佳,直到10月29日才发生第一例鼠疫病患,间隔24天,而非现在定论的2天。这一时间间隔,与衢州日机播撒含有鼠疫跳蚤的麦子到第一例鼠疫病发的30天时间比较接近。因为鄞县鼠疫战是一次实战试验,石井四郎和日军高度保密,中国方面无从知道10月5日飘旋在鄞县城区上空久久不散的“一股烟气”就是石井四郎投下的带有鼠疫跳蚤的毒气。那么,日军这一次实战试验为何采取这样一种实效不佳的“敌机散毒”方式呢?

二 拙劣的实战试验:日方史料中的“雨下法”撒毒

柄泽十三夫在1949年12月6日受审时供述有关石井四郎1940年在华中地区进行细菌战的三条重要信息。第一,1940年下半年内柄泽所主持的组员为石井四郎的远征队准备了“70公斤伤寒菌和50公斤霍乱菌”与“染上鼠疫的跳蚤”;第二,石井四郎远征队的作战对象是华中地区,目的是“具体战斗环境内进行探求大量散播细菌方法的实验”;第三,石井四郎此次“实验”产生效用的是

① 《敌机四架袭奉化,敌舰又袭镇港》,《时事公报》1940年10月6日,第2版。

② 《敌机昨结对袭击奉化,侵入本埠散发荒谬传单》,《宁波民国日报》1940年10月6日,第2版。

③ 《被告西俊英受审经过》,1949年12月25日晚庭审讯,《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264页。

“鼠疫跳蚤”，“石井将军远征队在 1940 年间使用鼠疫跳蚤，结果在散播此种跳蚤的地区内引起了鼠疫”。^①12 月 16 日滨海军区军事检察官、上校法官毕列左夫斯基在《起诉书》中援引柄泽十三夫的口供，进一步补充了有关“鼠疫跳蚤”的细节“我从第二部人员方面听到，第二部内为石井将军远征队培养了 5 公斤染有鼠疫的跳蚤，以使用去散布鼠疫。”^②也就是说，1940 年 731 部队第二部一共生产了 5 公斤染有鼠疫的跳蚤供石井四郎远征队使用。

柄泽十三夫的这两处口供没有说明石井四郎远征队究竟到华中哪些地区进行了细菌战。另一位被告西俊英供称“我还知道日军两次实际使用第 731 部队内所造细菌武器的事实”，其中第二次是“1940 年 5 月至 7 月间，由石井中将率领的第 731 部队远征队在华中宁波一带使用过鼠疫菌去攻击中国军队，方法是用飞机散播鼠疫跳蚤”。西俊英说他的信息来源是“训练部保险柜内发现的文件”，“文件上载明远征敢死队员担负有使用致命细菌的任务”。^③西俊英的口供明确了石井四郎 1940 年在华中地区的“宁波一带”实施了鼠疫战。

结合柄泽和西俊英的口供，1940 年石井四郎亲自对宁波实施了细菌战——采用飞机空中投下伤寒菌弹、霍乱菌弹和鼠疫跳蚤。那么，为什么鄞县只发生了鼠疫？在伯力审判中，日军细菌战战俘的口供，提供了石井四郎与日军 1940 年细菌战的诸多细节。

第一，飞机投掷和地面散布是日军细菌战的两种基本方式。伯力审判中，接任梅津美治郎担任关东军总司令的山田乙三在 1949 年 11 月 15 日的审讯中供称，他于 1944 年 8 月视察 731 部队，时任第 731 部队长的北野少将向他汇报，第 731 部队的“宗旨和任务”：“第一，是经管关东军内的防疫和给水事宜，第二，是研究各种与准备细菌战手段有关的问题”。在解释使用细菌武器的“手段和方法”时，北野称“在必须使用细菌来进行军事破坏时，是采在地面上散布的方法；而在广泛使用细菌武器时，则用飞机来投掷”。^④在 11 月 17 日的审讯中，（法官问）：请你说说，究竟研究出了使用细菌武器的哪些方法呢？答：据我所记得的，使用细菌武器的基本方法和最有效方法，原是从飞机上散布以及在地面上直接施放细菌。从飞机上散布时，是把细菌装在一个特制炸弹内，或者由飞机上的一种特别装置散播下来。直接在地面上施放时，用细菌去传染蓄水池，牧场和牲畜”。^⑤

第二，石井四郎与“秘密中的秘密”。前日军关东军军医处长梶塚隆二于 12 月 27 日早庭审讯时，“问：石井四郎什么时候对你说过该部队‘秘密中的秘密’呢？答：我记得是在 1941 年初。问：第 731 部队长石井大佐对你谈论的该部队‘秘密中的秘密’究竟是什么呢？答‘秘密中的秘密’，就是在准备细菌战方面进行研究及他种工作，以及这种工作的结果和用活人进行的实验。……问：石井曾认为何种传染病媒介物是最适合将来细菌战目的的呢？答：他在当时就已认为鼠疫跳蚤最为适合”。^⑥“问：你会知道使用细菌武器对付中国人的事实么？答：我是在 1944 年初从北野少将口中知道这点的。问：北野对你说过什么，以及当时有谁在场？答：他是在关东军司令部里，即在我的办公室里说及此事的。当时没有任何其他人在场。他当时对我说，石井部队内派出了由几个人组成的远征队，该远征队带着必需数量的器材到上海以南地区去动作，从空中撒放了鼠疫跳蚤。同时他还说这次实验所得的结果是很不错的。问：可见，北野将军当时向你报告了实际使用那些曾由石

① 《被告柄泽十三夫受审记录》，1949 年 12 月 6 日，《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 69—70 页。

② 《起诉书·在对华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 24—25 页。

③ 《被告西俊英受审记录》，1949 年 12 月 6 日，《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 66 页。

④ 《山田乙三受审记录摘录》，1949 年 11 月 5 日，《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 92—93 页。

⑤ 《山田乙三受审记录摘录》，1949 年 11 月 17 日，《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 96—97 页。

⑥ 《被告梶塚继续受审经过》，1949 年 12 月 27 日早庭审讯，《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 313—314 页。

井初次通知你说是最有效细菌武器的鼠疫跳蚤,这是对的吧? 答: 是的,对。”^①从梶塚隆二的供词可知,石井四郎的“秘密”指的是细菌战实验及实战试验“秘密中的秘密”指的是“最有效细菌武器是鼠疫跳蚤”和人体实验。因此,无论是大本营还是关东军,都批准石井四郎进行鼠疫战的实验和实战试验。

第三,鼠疫跳蚤“雨下法”是行之有效的细菌战方式。梶塚隆二于1949年10月23日受审时供称石井四郎于1941年2月在长春他的办公室内亲自向他汇报“将细菌直接装在飞机弹内投撒的方法是很少有成效的”,因为强大的空气阻力以及温度过高的缘故,像赤痢菌、伤寒菌、副伤寒菌、霍乱菌和鼠疫菌“这类不大坚韧的细菌,几乎是百分之百的死去”。一种“效力更大得多的细菌投掷法”“是不把细菌‘赤裸裸的’投掷下去,而是把它同媒介物一块,即同虫类,特别是同跳蚤一块投掷下去”。对此,石井四郎的依据是“跳蚤是最富有生命力的虫子,把跳蚤染上鼠疫后,就从飞机上投掷下去,而寄存在跳蚤体内的鼠疫菌,便能顺利地同跳蚤一起落到地面上”。对于鼠疫跳蚤的实战效能,石井指出“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工作尚未结束”。^②梶塚隆二的口供清楚表明,石井四郎在1941年2月已经清楚知道飞机投掷“鼠疫跳蚤”的效力远超飞机投掷细菌弹,且已经开展了实战“研究工作”。

石井四郎曾担任过“荣”字1644部队长,接替者是曾经在石井部队中服务过的大田大佐,小野寺中佐则担任该部队总务部长。1940年12月至1943年2月担任驻广州“波”字第8604部队长的佐藤接任“荣”字1644部队长。他在审讯中供称“我曾亲自听到太田大佐及小野寺中佐说,1940年在宁波一带,1941年在常德一带,1942年在浙赣动作时,均使用过细菌武器。并且当时所使用的,都是从飞机上撒放的鼠疫跳蚤。”^③10月25日晚川岛清受审记录显示: (法官问): 打算用什么方法把鼠疫跳蚤当做细菌武器来使用呢? 答: 在我服务期间被认为最有效方法的是从飞机上撒放跳蚤。问: 在到中国远征时也是从飞机上撒放跳蚤的么? 答: 是的,确实是这样。问: 这些些染有鼠疫的跳蚤么? 答: 是的。”当时利用鼠疫跳蚤在改进型细菌攻击的目的,是要引起鼠疫流行病。^④

第四,推广“雨下法”,实施鼠疫战。1940年石井四郎在浙江的细菌战,导致鄞县、衢县和金华三地的鼠疫流行。石井四郎以此作为“战功”游说日军参谋本部,在日军侵略战争中加大使用细菌战,尤其是鼠疫战。川岛清在受审时说“我记得,1941年6月,当石井将军从东京转回来后,他把本部队各部部长召集到自己办公室内开会,当时他通知我们说,他向日军参谋本部报告过,说第731部队已研究好了用染有鼠疫跳蚤作为细菌武器的方法,说这方面所达到的成绩可以大规模地实际用去达到战争目的。石井告诉我们说,参谋本部对本部队工作成果极为称赞,并指示我们要特别注意于改进并继续研究细菌作战武器。”^⑤山田乙三也供称“根据石井关于使用特种细菌弹的报告所作出的决定,是我的前任梅津将军采取的。我在查阅了石井的报告后,也认可了这种使用法……我个人认为使用鼠疫跳蚤一法效力极大,所以就认准了北野地报告以及他提议的细菌武器使用法。”^⑥也就是说,自从1940年浙江鼠疫战获得效果后,在石井四郎的鼓吹下,日军已将鼠疫战作为对华细菌战的重要方式。

① 《被告梶塚隆二受审记录》,1949年12月27日早庭审讯《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315页。

② 《梶塚隆二受审记录摘录》,1949年10月23日,《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104—105页。

③ 《被告佐藤受审记录》,1949年12月27日早庭审讯《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326页。

④ 《被告川岛受审记录》,1949年12月25日晚庭审讯《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264页。

⑤ 《川岛清受审记录摘录》,1949年10月23日,《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119页。

⑥ 《山田乙三受审记录摘录》,1949年12月1日,《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101—102页。

伯力城受审的日军战俘口供确定 1940 年鄞县鼠疫战是日军在华中地区首战,采用飞机上撒放鼠疫跳蚤的方式,即“雨下法”。但正如柄泽十三夫供称的,“因为这次实验是在敌军领土内进行的,所以实验结果未能确切查明”。^①日军口供对这场“首战”的时间和具体“效力”等,未有说明。近几年日本学者发现的《井本日志》和金子顺一的研究报告,为揭开 1940 年日军鄞县鼠疫战的相关细节,提供了可能性。

据《井本日志》记载:9 月 10 日,奈良部队的大田中佐、增田大尉联络,确定“10/9 搜索,宁波和衢县作为目标是否适当”。9 月 18 日他再次与奈良部队联络,明确“目标可设为宁波(附近村庄,每平方公里 1.5 公斤)”,以及“据山本参谋:1. 将稀释弹药大范围投掷,或将大浓度弹药较少次数投掷的两种做法;2. 为决定使用雨下法,而使用降落伞一事”等事项。^②由此可知,至少到 1940 年 9 月 18 日,日军确定鄞县为细菌战施行区域,采取方法为飞机“雨下法”,将稀释的细菌弹大范围投掷。

10 月 7 日《井本日志》记录“一、听取奈良部队的状况(山本参谋、福生大佐、大田中佐、金子大尉、增田大尉):1. 运输,迄今为止共 6 回(其中船运 2 回)。空运当日达到,船运约需 6 日,以后使用空运为宜;2. 迄今为止攻击 6 次(依表作了说明),跳蚤 1 克约 1 700 口;3. 期待效果的判定,密探;4. 气象测定于杭州将之移至现场,不可使用降落伞(仅指宁波,或为对宁波使用跳蚤)。”^③这又表明到 10 月 7 日,日机对预定目标一共实施 6 次“雨下法”攻击,其中针对鄞县特别说明采取了“鼠疫跳蚤”。《井本日志》关于 10 月 7 日前对鄞县采取鼠疫战的记录,与前文所述《时事公报》和《宁波民国日报》记载 10 月 5 日鄞县城区上空两架日机散下“白色烟雾”的新闻报道,不仅内容吻合,时间也一致。中日文资料相互印证,可证明“敌机散毒”确有其事。

10 月 8 日,井本熊男接到调令,离开南京,于第二日回到东京,在参谋本部第二科任职。11 月 25 日日军参谋总长杉山元向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和关东军司令梅津美治郎下达大陆指令第 781 号,命令“一、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命令,根据大陆指令 690 号目前正在进行的特殊的毒气弹实验于 11 月末结束;二、实验结束后所有的人员器材需尽快返回原来所属处;三、特别需要严重地注意保守机密”。^④从 10 月 8 日井本熊男离开南京到 11 月 30 日细菌战结束期间,日军在浙江哪些地方采取了什么方式的细菌战,由于日军已销毁相关档案资料,目前无法准确查阅。但金子顺一研究报告的发现,至少证实 1940 年 10 月 27 日日军对鄞县再次施行了鼠疫战。

日本细菌战研究者奈须重雄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找到的《金子顺一论文集》,是金子于 1940 年 6 月至 1944 年 7 月之间在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写成的 8 篇系列研究论文。其中第 3 篇《PX 效果测算法》(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第 1 部·第 60 号)收录的日军以往 PX 试验效果略算表,证实日军于 1940 年 10 月 27 日在宁波用飞机“雨下”2 公斤染有鼠疫跳蚤的异物,测算出一次感染致死 104 人,二次感染致死 1 450 人。^⑤

从《时事公报》和《宁波民国日报》记载看,10 月 27 日日机 3 次侵扰鄞县城区,第一次空袭发生于早晨 6 点 47 分,“敌机侵入本埠上空盘旋,并投下荒谬传单”,转向慈溪。^⑥据《宁波民国日报》消息,“首次敌机一架,侵入甬上空盘旋,散发荒谬漫画传单”。^⑦根据 10 月 5 日“敌机散毒”新闻,日机使

① 《被告柄泽受审经过》,1949 年 12 月 26 日早庭审讯,《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 280—281 页。

② 吉見義明、伊香俊哉《日本軍の細菌戦》、戦争責任資料センター《季刊・战争责任研究》第 2 期(1993 年冬季号),第 10—11 页。中译文见李海军等编译《侵华日军细菌战重要外文资料译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8—9 页。

③ 吉見義明、伊香俊哉《日本軍の細菌戦》、戦争責任資料センター《季刊・战争责任研究》第 2 期(1993 年冬季号),第 11 页。中译文见李海军等编译《侵华日军细菌战重要外文资料译介》,第 9 页。

④ 李海军等编译《侵华日军细菌战重要外文资料译介》,第 11 页。

⑤ 金子顺一《PX 效果略算法》,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第 1 部第 60 号,昭和 18.12.14(1943 年 12 月 14 日),近藤昭二、王选主编《日本生物武器作战调查资料》第二册,第 478 页。

⑥ 《昨晨敌机一架飞甬投荒谬传单》,《时事公报》1940 年 10 月 28 日,第 2 版。

⑦ 《敌机昨三掠甬空投大批荒谬传单》,《宁波民国日报》1940 年 10 月 28 日,第 1 版。

用“雨下法”时,也曾经“散发荒谬传单”,因此可以设想,10月27日“敌机散毒”采取的是同样方法,即将鼠疫跳蚤混在可高空抛下且能达到地面的物品中掷下。另外需要提醒的是,10月27日这次“敌机散毒”,选择的时间是早晨6点47分,按照幸存者钱贵法的回忆,“那天是阴天”,^①6点47分天蒙蒙亮,日机即便撒下“烟雾”,也未能如10月5日15点12分这样看得清楚。换句话说,日本再次对鄞县施行“雨下法”投掷鼠疫跳蚤是完全可能的。

参加过1940年“宁波作战”的原731细菌部队航空班成员松本正一在2000年向东京地方法院递交的证词中称“1940年夏秋,我奉命在杭州实施了3个月的细菌战”,其中“1940年秋,增田驾驶单发九七式轻型轰炸机,卫生兵今村为投弹手同机,将感染鼠疫的跳蚤放在两个箱子里,箱子被设置在飞机的机翼下。攻击的地区是衢县,称‘衢州作战’”;此后,“增田、平泽、佐伯又驾驶单发九七式轻型轰炸机出动,细菌攻击的目标是衢州、宁波、杭州,称‘宁波作战’。基于前次的失败,放跳蚤的箱子缩小,改成流线型,把五层左右的箱子平擦起来,里面装有跳蚤,投下时用电磁铁控制箱子的前后门,打开后,风力就把跳蚤吹落。箱子放在飞机的机翼下”。^②松本的证词证明1940年731部队先在衢县,后在鄞县实施了鼠疫战。由于技术不成熟,“衢州作战”时一个箱子打开,一个箱子未能打开,只能中途扔掉。“宁波作战”时用的是改进的箱子。从作战时间和方式看,与《井本日志》和金子顺一的记录一致,与西俊英看到的宣传片一致,更与《时事公报》等新闻报道的内容一致。

实战试验效果方面,石井四郎本人也承认采取“雨下法”直接从空中掷下细菌弹的“效力”不佳,除鼠疫跳蚤外,其他的霍乱菌等基本无效。因此,10月5日“敌机散毒”也有可能并未产生实际“效力”,鄞县也就没有发生鼠疫流行。而10月27日的“敌机散毒”,产生了“效力”。从一次感染致死人数看,金子顺一的研究结论为“104人”(截至12月8日),与《时事公报》统计的93人(截至11月28日)相差不远;与国民政府卫生部门的调查结果“97人”致死,比较接近。金子顺一的研究报告,证实了井本熊男10月8日离开南京时与增田等人的看法——“C(霍乱)不行了,P(鼠疫)也许可以成功”。

1940年10月份日军在宁波实施至少2次鼠疫战实战试验,虽然拙劣,但确实达到了石井四郎的作战目的。石井四郎也从中证实了鼠疫跳蚤的实战效力,并以此次鄞县实战试验为例,拍摄了一部向大本营和参谋本部邀功的“宣传片”。

三 从“有疑”到“确系”:国民政府对“敌机散毒”的调查

1940年12月3日《前线日报》刊登了一则新闻:10月22日,敌机□□宁波,当投下黄色颗粒之物,有弹性,当时不为人所注意。至27日,宁波发现鼠疫,蔓延甚速。11月初旬,敌机袭衢县时,在县西北之×地,投下同样之颗粒物,当经辗转呈送上级机关化验,比在颗粒上发现已死之跳蚤,但不能证实其即为鼠疫杆菌,但引起卫生当局之密切注意。11月27日,敌机于袭金华时,又在×地投下类似颗粒,即由警察检查送交浙江民众医院,经专家刘经邦(军政部第二防疫大队队长)、柯主光(闽省派赴浙省防鼠疫专员)、陈万里(浙卫生处长)鉴定,确为鼠疫杆菌。敌机散放鼠疫杆菌,毒害我后方军民,完全证实矣。^③这一则新闻报道揭开了1940年12月后浙江省官方对鄞县鼠疫肇因的认定模式。第一,10月22日鄞县上空敌机散下“黄色颗粒之物”,但“不为人所注意”,这是媒体第一次关于鄞县“敌机散毒”的报道;第二,11月初当衢县发现敌机投下“同样之颗粒物”,“在颗粒上发现已死之跳蚤”,但“不能证实其即为鼠疫杆菌”;第三,11月27日敌机在金华又投下“类似颗

① 《钱贵法谈话摘录》,附件三,黄可泰等主编《宁波鼠疫史实——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证》,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82页。

② 《原731部队航空班飞行员松本正一的证词》,王希亮、周丽艳编译《侵华日军731部队细菌战资料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94—395页。

③ 《防疫专家谈各地发生鼠疫确系敌机散放》,《前线日报》1940年12月3日,第4版。

粒”，经化验确为“鼠疫杆菌”后，敌机在鄞县、衢县和金华三地“散放鼠疫杆菌”，“至此完全证实”。换句话说，10月底敌机在鄞县投下“黄色颗粒”不被注意，到11月初衢县再次被敌机投下“同样颗粒”但不能证实，再到11月底金华又被投下“类似颗粒”，终于“完全证实”这一论知逻辑演变过程，实际上是“敌机散毒”的反向论证，即金华确认，再到衢县确认，最后鄞县确认。这种认定路径，在浙江省卫生处处长陈万里那里，有更为清晰的表述。

12月10日陈万里称“鄞县自11月10日后，已无新病例发现，前后共死67人，缘自发病前一星期，敌机曾在疫区上空掷下小麦2升左右，是否与疫病有关，未能断定”。^①日机散播“白色烟雾”中含有鼠疫跳蚤事，陈万里在鄞县调查未有所见，但是他于1940年11月27日到衢县视察该县鼠疫防治时路经金华，亲眼“见敌机一架散布白色物品，且有白雾一缕随之。当请许县长搜集备检，并电呈在案”；11月29日在衢县接到驻方岩省卫生处电话，“悉28日金华空袭时，又有敌机两架在南门外散布白烟，并有鱼子状颗粒落下”，经省卫生处卫生试验所技正吴昌丰亲赴金华检查，“确系鼠疫杆菌”。陈万里由此得出结论“依一般判断，28日敌机掷下物品中混有鼠疫杆菌，已无疑异。是则敌人采用不顾人道之细菌战……明确之证例。”在此基础上，陈万里又推论鄞县和衢县两地鼠疫肇因“该两县鼠疫之所以发生，似与敌机散布是项物质有极大之关联，且证以最近敌机在金华掷下鼠疫杆菌之举动，又可得一敌机施行细菌战之证明。”^②陈万里、刘经邦和柯主光3人于12月初在给浙江省主席黄绍竑的报告中强调鄞县鼠疫系因“敌机散毒”的认定逻辑，将“敌机散毒”聚焦于日机散下的“白色烟雾”和“黄色颗粒”以及承载两者的媒介物。由是，如何预防“敌机散毒”，注意收集、销毁敌机撒下异物，包括小麦、粟米和传单等，成为1940年12月初浙江省政府及浙江省所在的第三战区的重要工作。12月4日，浙江省政府奉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电，称“甬、衢先后发生鼠疫，据报病菌由敌机传播，虽未经切实证明，但事有可能。嗣后遇有敌机散布传单或任何物品，应立即焚毁，以资防范”。^③12月5日浙江省政府发出通知，称“自鄞衢两县先后发生鼠疫后，金华复于敌机掷下物品中，检出鼠疫杆菌。省府对此非常重视，除督饬卫生处以全力扑灭外，并特由省库拨款3万元，交该处当防疫经费”。^④

随后，顾祝同和黄绍竑将浙江预防“敌机散毒”事项向蒋介石作了汇报，以待中央指示。但中央政府并未作出积极回应。直到12月10日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李济因“敌机散毒”事电呈蒋介石，请求行政院各部协商、统筹全国预防办法，蒋介石才开始重视，命令行政院、卫生署会商，并在其日记中记录注意“倭寇施用毒瓦斯与其飞机散播病菌之宣传计划之准备”。^⑤

卫生署署长金宝善随即邀请卫生署、军医署，以及曾在中国东北协助防治鼠疫多年、经验丰富的国联防疫专家伯力士（Dr. Robert Pollitzer）等共同会商浙江鼠疫处置办法。在会上，伯力士对“此次浙省敌机散播含鼠疫杆菌颗粒之点”表示怀疑。他说：第一，“仅从显微镜检查发现之”，“自未便即可认为绝对真确”；第二，“鼠疫杆菌，除于鼠疫患者痰液一类之黏液物内能生活若干时间外，其他外界均不适于其生存”；第三，肺鼠疫症“大多为由有鼠疫性肺炎病人之咳嗽直接传播所致”，“但若仿效此种传播方法，而以飞机散播染有鼠疫杆菌之颗粒，而冀以能收到成功，不能不尚有所疑”。对此，卫生署认为“深有见地”，^⑥并于12月17日电告浙江省卫生处，拟派卫生署防疫处长容启荣、祝

① 《本年浙闽两省鼠疫情形》，1940年12月10日止，档号：L029—006—844，浙江省档案馆藏。

② 《陈万里、刘经邦、柯主光给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的报告》，1940年12月，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5册《细菌战与毒气战》（以下简称中央档案馆等合编《细菌战与毒气战》），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195页。

③ 《浙江省政府关于遇有敌机散布传单或任何物品应立即焚毁以资防范的密电》，1940年12月4日，民国档案2—3—4，遂昌县档案馆藏。

④ 《浙省严防鼠疫订颁紧急处置办法》，《时事公报》1940年12月5日，第2版。

⑤ 《蒋介石日记》，1940年12月30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

⑥ 《卫生署关于敌机袭浙散布颗粒状物检验为鼠疫杆菌致行政院秘书处公函》，1940年12月16日，L029—006—844，浙江省档案馆藏。

专员和叶墨博士“赴浙调查疫情”。^①

容启荣等人于1940年12月下旬出发前来浙江。1941年1月13日中午抵达衢州,会同当地防疫人员,稍事调查后离开衢州,于当天晚上到达金华,与浙江省卫生处处长陈万里等会合。第二天上午在中国旅行社大礼堂举行会谈,由陈万里“报告浙省疫情及敌机在衢金鄞各地投撒异物之经过”等,并到民众医院复查该院保存的“11月28日敌机散布之颗粒”,由叶墨、吴昌丰、柯主光三人“施行动物试验,并将颗粒制成标本”。下午则会同各人至城外疫区实地调查。1月16日,容启荣等在陈万里、刘经邦、吴昌丰、卫生署17队队长叶树棠和鄞县卫生院院长张方庆等陪同下赶赴鄞县,于17日下午到达鄞县,18日实地调查了华美医院、鄞县中心医院和已焚毁的开明街东大路疫区,并听取报告。18日下午应鄞县县长俞济民之约,会同陈、刘、张院长及华美医院院长丁立成等到县府会谈,“由俞县长等报告该县防治鼠疫之经过,述及二十九年十月廿七日敌机袭鄞时,曾在该区散下小麦等物。二十九日发现鼠疫后,查阅疫区,则见有数处该麦业已发芽,因此疑此鼠疫或与敌机散布小麦有关”。^②1月19日,容启荣等在安平旅馆邀集各负责人谈话,20日离开鄞县,21日抵达方岩,22日赴金华,23日到衢县,听取衢县鼠疫报告,24日赴上饶向顾祝同汇报调查经过及结果,提出三条调查结论。其中第3条称“至于鄞衢两地之流行原因是否与敌机散布麦蚤等异物有关,因当时检查程序未能完备,不能确证其带有鼠疫杆菌,而职等因证物不足,无从彻底复查。又以两地鼠疫病例传染情形记录欠详,更无从推测其来源。至两地报告因病例发现前并无大量死鼠发现,即以此说明与敌机之关系,似嫌不足。”^③这表明容启荣和叶墨等人并不同意鄞县县长俞济民等谈及10月27日敌机散下小麦等物与10月29日鄞县发生鼠疫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其调查结果与伯力士的判断基本一致,鄞县鼠疫系“敌机散毒”引发的因果关系,“似嫌不足”。

容启荣的浙江之行虽然否定了陈万里等提出的鄞县鼠疫“敌机散毒”说,但对陈万里等来说,他们仍然确信1940年浙江鄞县、衢县和金华三地的鼠疫系“敌机散毒”所致。实际上,在容启荣等来浙江调查前,陈万里、刘经邦、柯主光、郑介安和吴昌丰5人于1940年12月31日联署《吾人对于敌机在金华空掷物品检验结果的说明》,称“敌人的手段是卑劣的”。“敌人是先使老鼠人工感染得病,然后搜集在它身上所预先配置好的跳蚤!现在是已经含有鼠疫杆菌的蚤和着五谷之类,一起掷下。如此就可说明鄞衢两县鼠疫的来源,是由于敌人从天空中掷下含有鼠疫杆菌的人鼠共同蚤来传布鼠疫,是毫无疑问的了。”^④该说明称鄞县“于第一例病人发病前7天”,“曾有敌机散播小麦甚多”,但“鄞县没有发现跳蚤”,陈万里等给出的解释是,“跳蚤活的,掷下来后,它会跳走了,不能找到”。^⑤这两个问题需要弄清楚:第一,“第一例病人发病前7天”具体指哪一天?按照陈万里等人的说明,第一例病人发病于10月29日,那么“前7天”为10月22日。而前文已经论及,《时事公报》和《宁波民国日报》均未刊登10月22日敌机空袭鄞县城区的新闻,证明10月22日这个时间有误。实际上,《时事公报》报道第一例鼠疫病人的时间是11月2日,其“前7天”是10月27日,符合前文“敌机散毒”新闻和金子顺一研究报告对鄞县施行细菌战的时间。第二,如果敌机投下含有鼠疫跳蚤的“小麦”甚多,为何不见“跳蚤”?按照宁波人“喝天水”^⑥的习惯,开明街一带住户家家都准备有水缸储水,如果有跳蚤落下,必然会如同衢州一样,“因为一部分跳蚤掷到金鱼缸内,淹死了,所以就为居民所发现”。10月27日鄞县有“敌机散毒”但“没有发现跳蚤”,如何解释?实际上,陈万里等在说明开篇就指出1940年11月“廿七廿八两日敌机空袭金华,均有白色烟雾状的东西从敌机

① 《卫生署关于派容启荣等来浙调查疫情的电》,1940年12月27日,L036—000—061,浙江省档案馆藏。

② 《据本署防疫处处长容启荣等报告在浙考察研究鼠疫情各节呈请鉴核由》,1941年2月22日,L029—006—844,浙江省档案馆藏。

③ 《据本署防疫处处长容启荣等报告在浙考察研究鼠疫情各节呈请鉴核由》,1941年2月22日,L029—006—844,浙江省档案馆藏。

④ 《吾人对于敌机在金华空掷物品检验结果的说明》,1940年12月31日,民国档案2—3—4,遂昌县档案馆藏。

⑤ 《吾人对于敌机在金华空掷物品检验结果的说明》,1940年12月31日,民国档案2—3—4,遂昌县档案馆藏。

⑥ 《采访钟辉记录》,1965年4月28日,范思政记录,黄可泰等主编《宁波鼠疫史实——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证》,第84页。

散布空中。28日更在溪下街溪滩上空,白色的烟雾,经过三四小时不散”。^①这一状况,与前文所引《时事公报》和《宁波民国日报》刊登的10月5日鄞县城区“敌机散毒”时“白色烟雾”许久未散报道完全一致,与石井四郎拍摄的细菌战宣传片也完全一致。换句话说,日机在鄞县、衢县和金华三地采取同样的“雨下法”散播鼠疫跳蚤,其媒介物,在宁波是“荒谬传单”,在衢县和金华是小麦粟米等。

陈万里等5人的说明再次将1940年鄞衢金鼠疫归因于“敌机散毒”说,在当时也引起一些人的质疑。陈方之在《西南医学杂志》发表的论文即是一例。他说“陈君万里等说明书中所主张,都是推断臆度之辞。他们说金华敌机投菌,而金华并未发生。他们说鄞衢之疫,是敌机投下来的,而鄞衢又并未拾到疑似的疫苗。”他认为“倭寇的狠毒,诚然能无恶不作。然而我们要证明他的这一类作恶,应该有切确的科学根据才好”。^②有意思的是,当时提供“科学根据”证明陈万里等人说明结论的,恰恰是1940年12月对鄞县“敌机散毒”持否定态度的伯力士和1941年初赴浙江调研的容启荣,以及下令的卫生署署长金宝善。

1942年湖南常德发生鼠疫,行政院卫生署派防疫外籍专员伯力士博士、军政部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检验学组主任兼总工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部医防指导员陈文贵等前往常德调查。他们与常德广德医院院长柏南(Dr. Barman)在调查报告中称“根据多方研究及调查结果证明,此次常德发生鼠疫确系由敌机散播鼠疫杆菌或染疫之跳蚤传染所致”。^③这表明伯力士承认“敌机散毒”真实可信,也就否定了他关于1940年鄞县、衢县鼠疫“敌机不能散毒”的观点。

同样,赴常德调研鼠疫及防治的容启荣在其报告中也承认了“敌机散毒”事。他说“查暴敌施用细菌兵器,数年来迭据各方报告已有相当证据。二十九年冬浙江鄞衢两县突然发生鼠疫,启荣奉命前往调查及协助防治。据当时调查所知,两地发病前曾有敌机投掷谷麦等物,其情形与常德如同一辙。同年敌机又于金华散播黄色小颗粒甚多,经检验发现含有无数类似鼠疫杆菌,幸未有鼠疫发生。由此观之,常德鼠疫实系暴敌所散播,更无疑义矣。”^④容启荣得出“敌机散毒”有两方面的依据,一是伯力士等人的实地调查,二是援引1940年冬鄞、衢两县鼠疫肇因。这也表明,在1941年调查中对鄞县衢县两地鼠疫肇始于“敌机散毒”的结论“似嫌不足”的容启荣,也改变观点,认定鄞县鼠疫“确系”“敌机散毒”所致。

与容启荣调查结论一致,《常德鼠疫调查报告书》裁定“鼠疫传染来源系敌机于11月4日晨掷下之鼠疫传染物内有鼠疫传染性之蚤”。^⑤这亦表明,在常德鼠疫肇因调查中,“敌机散毒”成为定论。由此,1940年浙江鄞县、衢县和金华三地的鼠疫,确如陈万里等调查的研究结论,系日军散播鼠疫杆菌及染疫跳蚤导致,即为“敌机散毒”所致。

1940年10—11月鄞县鼠疫发生时,浙江省卫生处陈万里和从事浙江鼠疫防治的刘经邦等人,并不认为该鼠疫系“敌机散毒”所致。等到1941年11月底金华发生鼠疫前有“敌机散毒”事,他们才想起1940年11月衢州鼠疫爆发前的10月初亦有“敌机散毒”,而鄞县鼠疫暴发前夕也有“敌机散毒”。于是乎,陈万里等才一致认定鄞县、衢县和金华三地鼠疫肇因于“敌机散毒”。国民政府卫生署方面,先是国联防疫专家伯力士在金宝善召集的浙江鼠疫协商会上怀疑“敌机散毒”引发鼠疫的观点,为金宝善接纳,并派防疫处处长容启荣等于1941年1月抵浙调查。容启荣在调查后支持伯力士的判断,认为鄞县和衢县两地鼠疫肇因于“敌机散毒”缺乏科学证据。待1942年11月湖南常德鼠疫暴发,伯力士亲自赴常德调查,终于承认常德鼠疫系“敌机散毒”所致。容启荣的调查也持

① 《吾人对于敌机在金华空掷物品检验结果的说明》,1940年12月31日,民国档案2—3—4,遂昌县档案馆藏。

② 陈方之《闽浙鼠疫的展望》,《西南医学杂志》第1卷第3期,1941年。

③ 《浙江省卫生处关于湖南常德鼠疫确系敌机播菌所致饬一体防范准备的电》,1942年2月4日,J005—001—209,宁波市档案馆藏。

④ 容启荣《防治湘西鼠疫经过报告书》,中央档案馆等合编《细菌战与毒气战》,第225页。

⑤ 《常德鼠疫调查报告书》,1941年12月12日,中央档案馆等合编《细菌战与毒气战》,第235页。

这一观点。金宝善也随之改变旧见,肯定“敌机散毒”说。1940 年底到 1942 年底约 2 年时间中,浙江省卫生防疫部门和国民政府卫生署对“敌机散毒”说从怀疑、否定到肯定的观点转变,实际上是中国政府对日军细菌战认知变化的缩影,从“不知日军的行动意图”到“鉴于浙江之经验”,^①对揭发“敌机散毒”真相,预防“敌机散毒”,起了积极作用,也再次证明 1940 年浙江鄞县、衢县和金华以及 1941 年湖南常德是侵华日军细菌战,并不是什么民族主义驱使下的史学工作者“建构”出来的。

结语:无可辩驳的侵华日军细菌战史料与史实

本文用 1940 年《时事公报》《宁波民国日报》刊载的新闻报道、日军战俘伯力城审讯记录,以及前述两者和《井本日志》、《金子顺一论文集》的互证、国民政府卫生部门“敌机散毒”调查结论的演变等,证实“敌机散毒”是无可辩驳的史实。在论证过程中,本文不厌其烦地大段引用这些史料,展示“敌机散毒”在抗战时期卫生防疫人员、政府部门、日本军医和作战参谋、日军决策层和细菌战执行者中的具体表现,证明他们都没有作假,证明史学研究者也不是仅仅“只将对他们有利的材料拿出来说话”。所谓抗战时期和当下史学工作者基于“民族主义”建构了侵华日军细菌战的说法,既不尊重历史本身,也是对史学界长期研究侵华日军细菌战同道的不尊重,更是对遭受侵华日军细菌战同胞及其后人的侮辱与伤害。

1949 年 12 月 29 日,苏联医学科学院大学士茹科夫—费勒什尼科夫等 6 位医学生物学家组成的法庭医学检验委员会,在研究了军事法庭审讯山田乙三、梶塚隆二、高桥隆笃、川岛清、佐藤俊二、柄泽十三夫、西俊英、尾上正男、平樱全作等日军战俘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犯刑事罪一案的所有材料后得出结论。其中有关 1940 年鄞县“敌机散毒”的时间、方式、过程和造成恶果的文字,本文将引以作为结尾:

第一个问题:日本关东军第 731 部队和第 100 部队及日本驻华远征军“荣”字第 1644 部队所进行的实验与生产工作究竟是为了什么目的? 回答:第 731 部队,第 100 部队以及第 1644 部队内所进行的实验与生产,按其专门性质和特别内容说来,乃是为要探究和制造细菌武器以及研究使用此种武器的方法。……1940 年间,由石井四郎亲身率领了第 731 部队内一个装备有大量伤寒菌、霍乱菌及大量鼠疫跳蚤的战斗远征队到中国宁波一带去。由于用飞机散布法使用染有鼠疫的跳蚤的结果,在宁波一带发生过鼠疫流行症。该远征队在组织上和行动上的技术特征,就决定了当时受到普遍传染者的广阔范围。若估计到战时条件及与此有关的民众迁徙情形,就必得承认说,该远征队底活动特别是在散布鼠疫方面不仅对于中国宁波城内的居民,而且对于宁波附近许多区域的居民都是极端危险的。^②

历史不容篡改,不容戏说,更不容胡说。历史的真相存在于时间长河中,发现真相的路径永远只有一条,那就是实事求是,据之以史料,一分史料说一分话。

(责任编辑:王 鸿)

^① 容启荣《防治湘西鼠疫经过报告书》,中央档案馆等合编《细菌战与毒气战》,第 223 页。

^② 《检验委员会结论》,《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 436—437 页。